

政府购买背景下草根养老组织 社会资本建构的行动逻辑*

——以 M 市 Y 区 S 组织为例

张旭升 牟来娣

提 要: 社会组织的研究需要社会资本的理论予以扩充。本文运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着力深描草根养老组织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揭示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行动逻辑。研究表明,S 组织通过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主动适应与策略性运用,及对组织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需求的及时洞察与有效回应,成功建构了组织社会资本;互惠共生是 S 组织建构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 草根养老组织 组织社会资本 互惠共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且总体上能力不强的问题已直接制约了中国社会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观目标的实现。为此,各级政府在推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的同时,启动了公益孵化器、公益创投、能力培训等项目,以期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能力提升。这类被学界称之为“外部输入型能力建设”的实践,在解决社会组织初创期资金不足、场地缺乏等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存在供需脱节、社会组织“被培训”等弊病。正如康晓光等(2010)、邓国胜(2010)所言,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方面,如果没有本土内生的东西作为支撑,“外部输入型能力建设”就存在不

*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城市互助养老组织的生长机制及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BRK001,主持人:张旭升)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09CSH035,主持人:张旭升)的资助。同时感谢林卡教授、卢福营教授,吴海琳、管兵、李凌静、纪莺莺等老师的指点。本研究涉及的地名、机构名、人名都作了匿名化处理。

可持续的问题。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亟须开发本土案例，加强对本土经验的总结（付涛，2010）。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国内也涌现出像“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残友”、“慧灵”、“爱德基金会”、“太阳村”、“农家女”等一批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摸爬滚打”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知名社会组织。在养老领域，如天津的“鹤童老年服务中心”、南京鼓楼区的“心贴心服务中心”、宁波海曙区的“星光敬老协会”、杭州的“在水一方”等组织就属于此类。据笔者观察，这些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组织社会资本的构建。

近年来，有关组织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而对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少；对组织社会资本功能做静态分析较多而对组织社会资本建构过程做动态分析较少的局面。基于此，本研究将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背景下，以M市Y区S组织为例，考察其如何建构与基层政府、民政局、老龄办、街区、专家学者、志愿者、媒体等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探寻S组织建立、维护组织社会网络所采取的方式、策略，揭示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实践逻辑，以期为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二、组织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分析框架

（一）组织社会资本的内涵

本研究倾向于林南（2005：42）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即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一概念表明，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中，资源的动员或获取取决于行动者，行动者如何建立信任、社会网络并获取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的能力（Nahapiet & Ghoshal, 1998；程民选，2007；张超、吴春梅，2011）。本研究的行动者特指S组织，并尝试以S组织负责人顾女士的社会资本代表草根养老组织的社会资本。这虽受边燕杰和丘海熊（2000）在测量企业社会资本时，将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但也是基于草根养老组织关系网络与组织负责人关系网络具有高度重合性的事实。当前，中国草根养老组织的规模普遍较小，组织负责人是组织的主要出资方、法人代表，又是组织形成、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即草根养

老组织负责人在哪里任过职，做过什么事，与谁交往、认识谁等，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草根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资源动员或获取。

依据组织关系网络主体间权力关系的差异，将组织社会资本划分为纵向社会资本和横向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张宏，2007：32；钱海燕等，2010）。所谓组织纵向社会资本是指组织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间的资源。组织横向社会资本是指组织与其他平等主体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间的资源。权力不对称性和主体间相对平等分别是纵向社会资本与横向社会资本的鲜明特征。

（二）组织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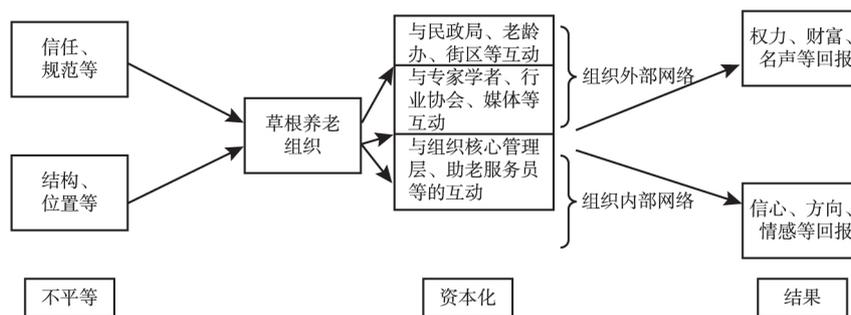
有关企业社会资本生成的研究集中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集群内社会资本、产学研联盟社会资本等议题上。这些研究都假定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企业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张明亲，2006），其中，信任、互动或互惠等是企业社会资本生成的关键性因素（陈丽琳，2007）。如陈传明等（2001）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生成与企业家的社会阅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与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等因素有关，而互惠与信任是维持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企业集群内社会资本的生成，则与成员间合作时间、交互稠密度、成员间信任水平等密切相关（蔡华林，2005；张魁伟、许可，2007）。产学研联盟社会资本生成是一个由关系嵌入而促进信任产生的动态过程，而社会网络的关系特征是产学研联盟社会资本生成的关键（丘緬、王浩，2015）。

市民社会组织和社团组织与社会资本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市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间互动和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培养信任、推动公民合作，是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所以，强化公民信任、促进公民合作、“编织”良好的社会网络，是市民社会组织和社团组织的固有功能（Putnam，1995；李茂平、阳桂红，2008）。福山（2016：29）认为，社团成员必备的情操和美德、成员间互助合作和成员间广泛的社会信任，是社团组织内社会资本生成的三个关键性要素。其中，信任是基础，互助合作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社会信任，提高聚合社会资本的能力。普特南、福山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市民社会组织或社团组织作为社会资本培育的载体、工具或平台，培育与生成的并非组织本身的社会资本，而是组织成员个体或社区的社会资本。

可见，组织社会资本的生成既离不开社会结构的促进与制约，又与行动主体间互动、建构密不可分。作为社会资本建构的行动者，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如何获

取与甄别相关信息，识别与捕捉结构中的制约与机会，增进信任、维护关系，汲取自身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资源，理应成为社会资本生成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

本研究将凸显社会资本的关系性与生产性（林南，2005：18；科尔曼，2008：279），凸显行动者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本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深描 S 组织纵向和横向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为此，本研究对林南（2005：235）社会资本理论模型进行修改，提出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结构、过程和效用的分析框架（见下图）。这个分析框架包括三组变量：第一组代表组织社会资本生成的先决条件与先兆因素：社会结构因素与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们影响了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投资；第二组代表草根养老组织建立和维护组织外部网络和组织内部网络所涉及的主体；第三组代表组织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回报。



组织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图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第一，社会结构、位置、信任、规范等变量如何促进或约束草根养老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第二，草根养老组织采取了怎样的方式与行动策略，以突破或利用社会结构的约束或促进，建构组织的关系网络、增进主体间信任、处理利益冲突等；第三，草根养老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给组织带来了怎样的回报？论文将着力探讨组织外部社会资本的建构方式与行动策略。

三、资料来源与个案简介

本文所用实证资料为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座谈会、文献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等方式获得。在半结构访谈法运用方面，笔者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参与式观察和座

谈会等方式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时代背景、运作过程、相关政策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5份分别针对民政部门、社区工作者、S组织负责人、服务投递者和服务接受者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然后在探索性访谈的基础上完善访谈提纲，最后正式访谈。

S组织创办于2001年，其前身是下岗职工顾女士创立于1998年的民办养老机构。该机构在顾女士的带领下，曾于1999年创办老年大学，又于2000年左右开办养老护理员培训班。2003年至今，S组织与Y区政府合作为辖区内孤寡、独居、困难老人等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保健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经过十几年发展，该组织已成为集机构养老、居家养老、老年大学和技能培训等为一体的服务机构。

本研究以S组织社会资本建构实践为个案，基于以下考虑：其一，S组织较早地与基层政府合作，成功探索出草根养老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模式，并得到全国老龄办、地方政府和学界的认可。其二，S组织无官方背景，它是在政府购买、床位补贴、项目资助等政策环境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草根养老组织，代表了未来社会服务机构培育与发展的方向。其三，S组织非常重视组织社会资本的建设，提炼并反思S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实践经验，对当前乃至今后大量社会服务机构社会资本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四，笔者曾在M市某大学学习，经导师引荐认识了S组织负责人，这为笔者获准进入“服务现场”收集翔实的研究资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四、草根养老组织建构社会资本的实践过程

（一）不平等结构下纵向社会资本的建构实践

1. 社会结构促进与约束下草根养老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21世纪初，中国大陆步入需要加强社会建设才能再造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孙立平，2009）。作为政策引导，中国行政官员考核体系中增加了公共服务、民众满意度、社会稳定等与政府职能转型密切相关的量化指标（渠敬东等，2009），并在一些地方试点“行政问责制”（高小平，2007）。作为社会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养老服务，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服务需求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如何增加供给并

创新供给体制与机制就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议题。作为回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1—2005年)》明确提出了在坚持政府主导,加大老年福利事业投入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并激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探索“公办民营”、“民营公助”等委托运作形式。

2000年左右,M市Y区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紧张的问题较为突出。为回应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Y区民政部门也曾尝试过政府投资兴建养老机构的解决方式,但终因土地成本不断上涨、运营成本较大,致使这一传统的应对之策推进缓慢。作为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紧张矛盾的另一可能——城市社区居委会张榜公布的社区服务,也因内容虽多达十数项,却很少向居民兑现,大部分是“空城计”的原因,成为应付上级检查装点门面的摆设(丁安祥,2001)。在此背景下,时任Y区民政局副局长的李某在考察港澳台养老经验时,萌生了政府为辖区内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钟点工上门服务的设想。但因方案未经深入论证、资金来源不明等原因而未获上级批准。

2001年,S组织创办社区服务中心,开始为大量有效需求不足的居家老人提供低偿或无偿服务。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该中心无力克服运营成本较高的难题,出现了严重亏损,急需另辟蹊径来应对生存困境。在S组织面临生存危机积极寻找外部力量支持的时候,Y区突发危机事件为S组织带来了生存的转机。2003年夏天,Y区发生了数起老人死于家中无人知晓的事件。在外部压力下,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正式开启。据时任Y区民政局局长的郑某介绍,事发当天正值周五,他们接到区委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指令:“不得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民政部门必须拿出具体办法,周一上区长办公会讨论。”在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约束与区政府领导人的直接施压、授权下,寻找一家社会服务机构为困难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成为Y区民政局的迫切需要,此前被搁置的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养老服务的方案获得了被重启的机遇(张旭升等,2013)。宏观养老政策的发展趋向与民政部门领导人的政策创新构想,为基层治理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而这种迫切需要正好与S组织积极寻找外部力量的支持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想法“不谋而合”(张旭升,2011)。

2. 草根养老组织赢得老龄办信任、认可与策略性争取权益的实践

既有研究表明,信任与合作呈正相关关系(张康之,2008;陈秀峰、李莉,2008),信任促进互惠合作,创造社会资本(Putnam,1995;福山,2016:57)。而当前,民间组织信任度偏低仍是制约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徐贵宏,

2008; 王浦劬、莱斯特等, 2010: 30)。在此背景下, S 组织如何赢得老龄办、街区等主体的信任与认可, 是 S 组织在建构社会资本和推进政社合作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S 组织采取的行动策略如下:

(1) 规范运作。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探索的初期, S 组织既面临着居民对社会服务机构的不信任,^① 也经受着老龄办怀疑 S 组织资金使用不合规、参与助老服务的人数和享受上门服务的老年人数量不真实等问题的考验。为了消除合作方的怀疑与担忧, 第一次年审后, S 组织就吸取教训, 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加强资金使用的规范化管理, 并积极主动地接受监督以赢得合作方信任。正如顾女士所言,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要把我所做的理得清清楚楚的, 省得你说话。而且我的账也做得很清楚, 那些没有发票的, 全都不在账里面。什么东西都要将它做得很仔细……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老龄办主任不太相信民间养老组织。后来, 我做了以后, 她就叫我们带她去看。我就跟我们李老师讲, 你把名单带着, 她点名, 你叫她划, 她划到哪里, 你就把她带到哪里。所以, 后来她就不讲了, 现在就好了”。

(2) 额外付出。在与老龄办合作的过程中, S 组织并未停留于完成购买协议规定的任务, 还积极地进行“额外付出”: 第一, 充当民政局的信息员, 为民政局考评社区提供参考。S 组织主动上报旗下 400 多名居家养老服务员在服务投递过程中所掌握的社区工作情况, 为民政局针对社区的评奖工作提供了辅助性支持。第二, 充当老龄办的监督助手, 为居家养老服务资格遴选提供协助。据顾女士反映: “有的社区将一些经济状况很好的或孩子住在附近的老年人(的申请表)也交上来了, 将社区主任的父母报上来的也有。然后, 我们就将那个表填好……。我们也不得罪人, 填好表之后, 我们就将它交给老龄办, 让他们去退, 直接退到社区。所以, 每次老龄办拿到社区报上来的名单, 他首先交给我们, 现在实际上政府也没有给我们这个钱, 按道理, 政府在这一块也要埋单。为什么我们跟政府的关系这么密切呢?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这种事情, 代他们把事情做好, 做了以后我们就给他(们)汇报。”第三, 承接民政局委托的其他临时任务。

尽管诸多研究表明, 政社合作的规范化需要厘清合作方的权责关系与行动边界, 但本案例中的 S 组织为了取得资源供给方——老龄办的信任与认可, 采取额外付出、

^① 政府用 15 万元购买 S 组织的居家养老服务,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很离奇, 很多人搞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会把那么多钱给了一个民间养老组织, 以至于有人到市委大门口喊: 顾女士拿了政府 15 万元。详见《一个民间养老组织参与社会养老的 9 年探索》, 中国养老社工网 www.chinayanglao.org。

模糊行动边界的行动策略，增加合作的附加值，通过合作的溢出效应，展示了 S 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诚意与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双向依赖的合作关系。

(3) 主动创新。S 组织之所以能够赢得老龄办的持续支持，与该组织深谙创新要义，能够前瞻性地把握并积极主动地回应资源供给方不同阶段的需求不无关系。合作初期，S 组织主要协助政府应对危机事件，以解当地居家养老服务短缺的燃眉之急；后来，S 组织洞悉政府治理创新的意图，通过与政府协同合作，Y 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践成为该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典型；最近，S 组织又积极回应民政部门有关在养老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号召，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居家养老服务的新模式^①。正如顾女士所言：“反正怎么讲呢，就是超前一点。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人，而在于你什么事情做得比较新一点，在于跟着政府这个路子，跟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你不把社会工作引进来，你还是属于管理型的。”

可见，S 组织在建立与维护与老龄办合作关系时，洞悉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不对等格局，通过规范运作、额外付出、主动创新等行动策略，拓展了与老龄办的利益契合度，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度，体现了 S 组织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不断响应老龄办不同阶段差异性需求的应变能力，并具有适时妥协的勇气。

此外，S 组织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通过“诉苦”和“说理”并举的行动策略争取利益，积极影响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调整。正如顾女士所言：“反正他们（领导）来之前我就要他们（员工）做好准备工作了，让她重点讲什么，你重点讲什么。然后呢，他们就说工作是怎么辛苦，他们是怎么干的。其实讲的呢，全部是感动人的……。后面，我就讲了……。不过，在平时开会的时候，我跟我们员工都讲过了，我说民政局会尽量代我们要钱。最后，好像他们（政府）自己每年也就给我们加一点。不过，要钱是可以，但是你要将事情做好。员工这边我是压一压，那边（民政局）我再努力去争取。加强沟通，这个沟通的技巧，你要掌握好就行了。”

3. 草根养老组织赢得街区信任与认可的实践

虽然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 S 组织嵌入街区提供了制度基础，赢得老龄办的信任与认可也为 S 组织嵌入街区创造了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街区会积极支持和配合 S 组织的活动。在一些街区看来，S 组织在与他们争夺基层政府有限的

^① 顾女士在 60 岁时顺利通过了国家社会工作者（中级）的考试。

财政资源，并可能降低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既有的研究亦表明，街区对外来民间组织的抵制与排挤现象较为普遍（王浦劬、萨拉蒙等，2010：31；朱健刚、陈安娜，2013）。而政府购买的有效供给却离不开街区的参与和协助。所以，如何克服街区的排斥，赢得街区支持与配合，是 S 组织与政府合作和加强组织社会资本建设时绕不开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为此，S 组织采取了以下行动策略：

(1) 做好服务，缓解利益冲突。2003 年，Y 区民政局曾向街区承诺 15 万元老年活动经费，由其招募志愿者为一些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但在几起老人死于家中无人知晓的危机事件发生后，区民政局未兑现对街区的经费承诺而将这笔资金用在了购买 S 组织的居家养老服务上。这引起了街区的强烈不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外来的 S 组织，并试图以直接拒绝或消极合作的方式进行阻挠。对此，S 组织采取了坚持做好服务赢得民心的行动策略。如 2004 年春节期间，S 组织主动将一些不会做饭的老人接到养老院短暂吃住，还向一些不愿离家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这不但得到老人的认可，还帮助街区解决了难题。“这个事情做得是好！漂亮！然后，他们也没有话讲。”S 组织领导人顾女士这样向笔者描述当时服务的效果。随后，在区民政局的支持下，S 组织于 2004 年 3 月采取了与街区直接对话和沟通的行动策略，倾听其意见与建议，并竭力改进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街区的不满情绪，缓解了彼此的矛盾，展示了组织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提升了组织的公众认可度，初步建构了组织的社会资本。

(2) 互利共赢，提升互惠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城市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的再就业一直是基层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和街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合作初期，S 组织对社区的这项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据顾女士介绍，S 组织管理层在走访老人时一般会带上一些助老服务员。后来，她们发现社区主任或书记非常抵触这件事，拒绝接受组织介绍过来的助老服务员。顾女士了解到其中的缘由后，^①就改由社区主任或书记向组织推荐本社区的助老服务员。顾女士说，“后来，我们就到他（她）那边去，问你这儿有多少老人，然后（问），你看看你这边有没有愿意做助老服务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有，请他（她）到我们这边来培训。后来，我们培训也搞上去了。所以呢，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带人家共赢”。

^① 社区主任或书记要亲自抓所辖社区内“4050”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可见，S 组织在碰壁之后能适时调整行动策略，既缓解了老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紧张的问题，又解决了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难题，支持了社区主任或书记分管的再就业工作，契合了“一岗解两难”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初衷，还为服务投递者就近就业，减少交通、时间成本，缩短与服务对象的磨合时间等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老人也喜欢熟悉的人为其服务。

(3) 信息共享，增进合作效益。按规定，服务投递者在受 S 组织管理的同时还要接受社区的监督。对此，S 组织要求组织管理层积极主动地与社区领导沟通，倾听其意见与建议，并要求服务投递者定期向社区领导人汇报老年人的最新情况。若遇突发事件，服务投递者需第一时间向组织、社区汇报。S 组织信息共享的策略有效降低了社区获取信息的成本，为社区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正如顾女士所言：“这样社区也高兴，也不难堪。如果我们不难堪，叫社区难堪也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讲，S 组织扮演了社区老年工作的“信息员”、“好帮手”角色。作为回应，街区也借助这一沟通渠道将服务投递监督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 S 组织，便于组织及时处置，而不是上报给 Y 区民政局。可见，通过信息共享，S 组织与社区间建立起了协同回应基层突发事件的联动机制，为双方工作带来了主动性，为 Y 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必要的保障，S 组织的社会资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正外部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4) “功成弗居”，融洽合作关系。调查显示，S 组织为了赢得社区的支持，采取了“功成弗居”的策略，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当着政府相关负责人的面，S 组织不提自身为社区所做工作，而是对社区的支持表达谢意。正如顾女士所言：“你给它（街道、社区）做事，你还得要表扬它。他们有什么不支持你的呢。一开会，这个关系不就融洽了吗？”S 组织的这一“干实事不居功”的行动策略客观上拉近了与街区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维护了合作关系，积累并提升了 S 组织的社会资本。

总之，在与街区合作的过程中，S 组织始终坚持以做好服务、让服务落地生根为行动基点，通过主动沟通、互利共赢、信息共享、功成弗居等行动策略，展示了它卓越的化解矛盾与冲突的沟通协调能力，善于发现并满足合作方需求并促成共赢结果的妥协与双赢智慧，有效地增进了政社间信任文化的渗透、内植，S 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潜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提升，也为其可持续性嵌入街区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二) 平等结构下横向社会资本的建构实践

当前,学界对社会组织与政府正式合作关注较多(何艳玲等,2009;朱健刚、陈安娜,2013),而对于社会组织与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非正式合作关注不够。已有研究亦表明,比社会组织是否独立于国家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在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结的程度有多高(王绍光、何建宇,2004)。而社会组织在非正式合作中所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有多大,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资源汲取能力和组织可持续运作能力,甚至决定着政社合作的成败。S组织横向社会资本的建构实践如下:

1. 广纳贤智,批判式吸纳专家思想

据顾女士介绍,她非常喜欢通过媒体、学术会议、参观考察等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倾听专家学者的观点与思想。这种倾听并非教条式地全盘吸收,而是结合自身实践予以批判式吸纳。正是通过批判式倾听,S组织辨清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趋向,增强了创业的信心,明确了组织运作方案,使组织的良性运行得到“思想”保障。顾女士说,“对于专家学者所讲的话,你也不能说他们讲的所有的都有用,但是呢,你一定要晓得他讲的东西,对于他讲的东西,你要结合你自己的实践去思考,有时候你碰到瓶颈的事情,你可以问他”。^①作为回报,S组织也积极回应部分专家学者的利益关切,如作为实务领域的代表积极参会发言,分享S组织探索的经验与困惑,并在会后带领他们参观一些养老机构和设施,甚至为专家学者所推荐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等资源。

2. 网聚行业资源,积极借力行业协会

S组织参与的行业协会包括准官方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性的行业组织。虽然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因官办色彩较浓、缺乏自主性等问题被社会各界诟病,邓国胜(2010)称之为“二政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官民色彩兼备的行业协会兼具管理、服务功能,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S组织重视与它们的合作,为其生存与发展汲取体制内外的资源。具体表现为:

(1) 积极参与省老年协会活动,获得协会的技术支持与业务指导。顾女士较早地成为了省老年协会的理事,并为S组织的发展赢得了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等。如省老年协会曾对S组织如何运作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并发挥最大的服务功能开展过多次研讨,并最终形成了《S家庭养老服务网络组建计划书》(范炜烽等,2010)。该

^① 譬如S组织的运作方案草案就由她插队时的同学亲自拟定。

协会的技术支持与业务指导,不仅为S组织明确组织定位、发展方向、服务内容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信息保障,也为其较早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创造了机会。正如她所言:“省老年协会会给你技术层面、业务层面的指导……它一年的活动比较多,会带你到各个地方去看,参观养老院啊,然后进入学术界讨论,你可以参加,对吧。然后,它也帮你宣传,帮助你沟通很多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办老年大学,就是它们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你就是做得再好也没有什么用。”

(2) 加强与妇联组织的合作,赢得扶持与机会。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它在反映女性权益诉求、化解矛盾、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据顾女士介绍,2000年,S组织开展养老护理员培训时,部分女性“4050”人员就是由省妇联召集、牵线的,并获得劳动局7000元培训费资助。与此同时,妇联还为顾女士提供了各种考察、学习的机会。通过考察学习,S组织加强了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拓宽了组织领导人的视野和关系网络^①,使其辨清了养老事业发展的趋向,坚定了引入社工理念与方法的决心,拓展了S组织的服务内容^②,解决了S组织发展中的部分困惑与问题。^③

(3) 积极组建利益相关者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在S组织积极倡导下,2005年,区域内资源互补型的17家社会服务机构组建了“协和中心”,并一致推举顾女士担任总经理。该中心涉及老年艺术团、老人房产中介、老年康复、谈心社、老年公寓、丧礼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心明确规定所有成员要做到信息互通、物资互济、资金融通、道义互援、人力互助,使得各会员单位在互助共济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回应辖区内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组建该中心为S组织公信力的提升、资源的整合、生存空间的拓展等积累了经验和资本。

3. 整合志愿力量,充实服务队伍与培育组织文化

民间组织吸纳志愿者资源的多少是衡量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培育组织志愿文化、服务伦理的基石(杨团,2001)。S组织的志愿者主要由社会工作、老年

① 如在考察学习中,她与香港圣公会总干事、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等专业人士建立起联系,为其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提供了专业力量的支持。

② 如Y区在冬天为独居老年人提供洗衣和洗澡项目以及在自家的养老机构中开辟佛堂等服务内容都与这些考察与学习有关。

③ 如对日本一家养老机构的考察让她掌握了日托服务费用的测算方法并理解了日托比全托收费更高的原因。

学等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和退休医护人员组成。这些志愿力量的加入不仅充实了 S 组织的服务队伍, 也为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与做法, 触发了 S 组织在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上的转变, 还对培育组织的志愿文化和服务伦理的倡导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而 S 组织之所以能聚集到各类志愿力量, 一方面与其在 M 市业已建立起来的影响力、与专家学者良好的合作关系等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也与 S 组织重视对志愿者的管理与激励不无关系。^① 而上海罗山会馆的经验表明, 机构必须有生气, 项目必须办得好才能长期吸纳及需要志愿者资源 (杨团, 2001)。

4. 重视宣传推广, 选择性借力媒体提升组织“公信力”

对于 S 组织而言, 选择性地与媒体合作有两层含义: 其一, 在项目运作的不同阶段, S 组织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在项目探索初期, S 组织按老龄办的要求采取了“不报道、不声张、不宣传”的“三不”的行动策略。而在项目初见成效后, S 组织和老龄办都产生了对外宣传的需要。即作为一项创新性实践, 在推进的过程中, 需要利益相关者了解、认同、支持, 从而争得该项服务的合法性地位, 进而保证其可持续运作。正如伯格、卢克曼 (2009: 53) 所言, 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在合法化的过程中, 也需要证明并回答“何以如此”的问题。其二, 针对不同的媒体, 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对于媒体正面的报道, S 组织予以积极配合。文献资料显示, 这类报道大多以赞扬、肯定为主基调, 以介绍感人的事件或人物为主要形式, 对该项服务的运行情况、作用及效果做了生动的描述和报道。这对 S 组织获取合法性、公信力以及组织关系网络的建构等都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对于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 S 组织则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动策略。据顾女士介绍, 曾有一家当地媒体质疑 S 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动机, 并写好了新闻稿, 后经顾女士多方运作, 这篇新闻稿才没被刊登。

综上所述, 草根养老组织通过与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志愿组织、媒体等建立相对稳定的组织关系网络, 动员并获取了组织发展所需的观念、信息、智力、技术、机会、服务、人力、资金等方面的资源。组织横向社会资本不仅为草根养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且为草根养老组织有效地嵌入基层治理结构, 赢得民政、老龄办、街区的信任与认同, 推进纵向社会资本的构建等创造了必要条件。

^① 顾女士指出, 第一, 你要了解志愿者到底需要什么; 第二, 要登记、记录; 第三, 组织要提出相应的要求; 第四, 每年都要有相应的激励, 给予志愿者一些回报, 这种表彰与回报要因志愿者类型的不同而有差别。

五、结论与讨论

(一) S 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实践逻辑

S 组织社会资本建构,是基于 S 组织对“强政府弱社会”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主动适应与策略性运用,以对组织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需要的及时洞察与有效回应为保障。如 S 组织负责人一方面洞悉了草根养老组织在政社合作中所面临的不平等地位、制度性限制、资源约束等问题,认清了组织关系网络中参与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采取了不断回应基层政府和街区的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策略。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既表现出不局限于一时得失、适当妥协的精神,打破僵局的勇气,又掌握了灵活变通的技巧,通过情理并用、策略性互动,积极地推动政府购买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有理、有节地维护并争取组织及其员工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 S 组织积极主动地与妇联组织、老年协会、专家学者、媒体、志愿组织等建立并维护着良好的关系网络,并适时动员、获取 S 组织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信息、财富、权力、公信力、认同等资源。

互惠共生是 S 组织建构组织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菲佛、萨兰基克,2006:2)。为了生存,组织会依据某些条件,理性地选择与相关资源方进行互惠性合作(Lin,2001)。S 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成功实践表明,S 组织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组织生存发展和竞争性优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S 组织的社会资本不仅拓宽了 S 组织的资源汲取渠道,同时也对草根养老组织的创新、组织能力的提升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 S 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在明确组织自身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采取开放性、包容性合作姿态,寻找利益契合、资源互补的利益相关主体,在不断回应利益相关主体需求的基础上,赢得合作方的信任与认可,并为之建立起互惠共生、稳定的关系网络,互惠共生是建构组织关系网络的内在机制。

(二) 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观目标的实现,需要大力培育与扶持社会组织。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各级政府在推进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更需要夯实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等工具,为培育与扶持组织社会资本

建设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购买的认识误区，夯实政府购买的财政投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高效率”不应以降低服务投递者单位时间劳动报酬为代价，^①这是发挥服务投递者和民间养老组织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其次，需要通过政府购买、公益创投等政策工具，对民间养老组织给予强有力、多方位的扶持，以缓解初创期的民间养老组织在成长过程中资金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推动民间养老组织健康成长。最后，规范政府购买行为，健全服务过程、服务质量与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完善以服务效果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其二，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应着力搭建一个集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志愿团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理念沟通、信息共享、资源互补等创造必要的组织环境，推动多元主体间跨部门的平等合作与协同创新。其三，社会组织应重视对组织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需求的洞察与有效回应，着力编织组织外部网络。

有关政社关系、政社合作或社会组织自主性等研究需要社会资本理论予以扩充。依赖与自主是政社关系、政社合作中的两个核心议题。学界普遍强调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中拥有自主性的重要性，但吊诡的是，研究结论普遍显示合作中自主性匮乏（姚华，2013）。已有学者指出，国内学者讨论社会组织自主性时，对“自主性”内涵的理解各异，对概念的操作化分析显得较为随意（黄晓春、嵇欣，2014）。实际上，组织间的依赖是相互的（何艳玲等，2009），组织的自主也是一个相对概念。鉴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合作中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观念、资源、权力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冲突、较量。对于这些分歧、冲突与较量，如果不加以辨别，一味地强调各自的立场与主张，强调自主性的重要性，而忽略合作双方的适应性调整与妥协、相互让渡生存空间、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凯特尔，2009），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合作中的矛盾、分歧与冲突。在研究中，我们也不应抽象、静态、单向地探讨组织的依赖与自主性，而需要将组织的自主性置于特定的组织生态及情境中，在动态的、双向或多向的社会关系网络互动中，考察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观测组织的自主性及其成长过程。S组织社会资本运作的成功实践业已表明，在S组织还较弱小的时候，甚至连组织的合法性都还没有确立的情境下，S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对政府的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组织的

^① 如2008年，该地区市场上保姆平均薪酬为12~15元/时，而M市Y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补贴标准却是8元/时。这类现象在其他地区亦普遍存在。

自主性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组织生存的需要。而在 S 组织凭借其有效的服务供给赢得政府、街区的信任与认同,又通过互惠共生的机制编织起强有力的组织社会资本后,S 组织资源汲取能力与发展空间都有了较大的拓展,组织的自主性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可见,组织社会资本是影响政社合作中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与不足:首先,组织纵向社会资本建构呈现了一定的动态过程,但组织横向社会资本建构过程尚未做进一步深描;其次,对组织纵向社会资本与横向社会资本的关系还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再次,S 组织负责人社会资本与组织的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较大的重合性,但两者毕竟不能等同,研究结论的信度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确证;最后,本研究的结论基于个案经验,结论的效度还需要更多成功或失败案例和定量研究予以完善和深化。

参考文献:

- 边燕杰、丘海雄,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伯格,彼得,托马斯·卢克曼,2009,《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蔡华林,2005,《企业集群内社会资本演进的动机机制研究》,《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第6期。
- 陈传明、周小虎,2001,《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若干思考》,《南京社会科学》第11期。
- 陈丽琳,2007,《企业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制约因素及其治理》,《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陈秀峰、李莉,2008,《信任合作的治理:论公民公益行为与中国公益基金会发展》,《广东社会科学》第5期。
- 程民选,2007,《论社会资本的性質与类型》,《学术月刊》第10期。
- 邓国胜,2010,《政府与 NGO 的关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 菲佛,杰弗里·杰勒尔德·R. 萨兰基克,2006,《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丁安祥,2001,《制度化——社区服务的当务之急》,《民政论坛》第4期。
- 范炜烽、祁静、薛明蓉、郑庆、甘筱敏,2010,《政府购买公民社会组织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科学决策》第4期。
- 福山,弗朗西斯,2016,《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付涛,2010,《NGO 能力建设何去何从?》,《中国发展简报》4月8日(<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d4f40727-8cbc-43eb-9f36-a2309f68de45>)。
- 高小平,2007,《深入研究行政问责制切实提高政府执行力》,《中国行政管理》第8期。
- 何艳玲、周晓锋、张鹏举,2009,《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黄晓春、嵇欣,2014,《非协同治理与策略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凯特尔,唐纳德,2009,《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康晓光、郑宽、蒋金富、冯利,2010,《NGO与政府合作策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科尔曼,詹姆斯,2008,《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茂平、阳桂红,2008,《民间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林南,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横向、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经济科学》第3期。
- 丘緬、王浩,2015,《基于关系嵌入的产学研联盟社会资本生成机制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第22期。
-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孙立平,2009,《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等,2010,《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绍光、何建宇,2004,《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浙江学刊》第6期。
- 徐贵宏,2008,《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政府部门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实证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杨团,2001,《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托管的新模式——以罗山市民会馆为例》,《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姚华,2013,《NGO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为个案》,《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超、吴春梅,2011,《民间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与治理网络——以浙江商会为研究对象》,《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6期。
- 张宏,2007,《企业纵向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康之,2008,《论信任、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人文杂志》第2期。
- 张魁伟、许可,2007,《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运行机制》,《经济学家》第4期。
- 张明亲,2006,《企业社会资本概念模型及运作机理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张旭升,2011,《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旭升、牟来娣,2013,《民政部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制创新研究——以南京市Y区为例》,《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朱健刚、陈安娜,2013,《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hapiet, J., Ghoshal, S.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政社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 葱

of mental stress leading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ental disorders.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a large sample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people and its mechanism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ontinuing low level and downturn of mental health level may possibly result in depression even more. The social status of generations in family has remarkable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the lower rung on the social ladder , the higher level of chance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ids i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 but this kind of effect comes mainly from the downward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fast transforming process may possibly be the deep structural causative factor in the high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Seeing Old City as Arrival City: A Case Study of One Rural-migrant Community in City H under Pluralistic-community Perspective *Gao Yunhong & Yin Haijie* 56

Abstract: Taking a rural-migrant community at the center of City H as an example ,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ree kinds of actors' value pluralism and practices of the old city. First , the urban administration , the urban planners , as well as those residents with high-modernist 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 believe it necessary to clear the old city and the rural migrants. Secondly , the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have an ambivalent and complicated position. Thirdly , utilizing the space properly , the rural migrants have established an arrival cit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old cities is valuable and important for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iversity.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Assimilation: Based on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andless Resettlement" Project *Gao Xinyu & Xu Jiajun* 73

Abstract: A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arge projects , the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is growing rapidly. The primary problem in this process i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immigrant group into the resettling communities. The paper focuses on Bei Yuan community ,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production of community space in the structured context of the reframed urban space.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community assimilation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s of their livelihood , social , cultural ,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Meanwhile , the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cause the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t a lower assimilation level at the beginning period.

A Study on Behavior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ment Purchase Policy: A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 S of District Y in City M *Zhang Xusheng & Mu Laidi* 94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for

elderly care to reveal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S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its insight into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 and its adaptation and strategic usage of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Meanwhile , the successful recognition and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demand of the plural subject in th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also helps significantly. The reciprocal symbiosis i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S organization.

A Study on Behavior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ment Purchase Policy: A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 S of District Y in City M

..... *Zhang Wangcheng , Liu Xiaoyan & Zhang Ting* 111

Abstract: Family volunteering refers to the volunteer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members of a family as a joint activity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1990s , the family volunteering was intentionally promoted by NGO and government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family volunteering had wide positive impacts on families , communities ,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In China , however , the policy aimed at promoting family volunteering has shown no obvious achievement , because both the policy maker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lack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family volunteering.

Video Ga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Underclass Youth’ s “Conditional Subculture”: A Case Study of School A in City C

Su Yihui 126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research in school A , a vocational-technical school in City C ,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sub-culture in this school. It argues that the cri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schooling and students’ separation from the families lead the students to the addiction to video games. While playing video games , the students build a boundary of their group , form their skills of cooperation and inter principles , and strengthen their solidarity. We name this kind of subculture “conditional subculture” , which meets three conditions: the failure of the stude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dominating culture; the fracture of class cul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society.

SURVEY REPORT

Peasant Cooperation in China’ s Rur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Hengqu Village

..... *Zuo Wenmin* 148

Abstract: In China’ s rural society , cooper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form of production. Meanwhile , in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 cooperation is also considered one of the solutions to a series of social and